

# 戰爭與族群互動： 太平洋戰爭中的華僑、 臺灣人和東南亞 亞原住民

李盈慧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一、前言

關於太平洋戰爭的研究，受到較多關注的，是戰場的情況、戰爭的侵略者、戰爭的責任問題等，至於被占領區人民的生活、思想的變化、各族群間的互動等等，則甚少成為研究的主题。

本文希望探討被日軍占領下的東南亞地區不同人群的互動，以當地的華僑為主角，考察華僑在東南亞地區與臺灣人、與東南亞原住民之間的往來情況。當太平洋戰爭來臨時，不少華僑在當地已居住了相當長的時間，他們原本已長期與當地原住民有所交流，然而戰爭改變了華僑與原住民的互動情況；而臺灣人則在日本人統治下，或由於經商、就業，或因為戰爭動員而前往東南亞，他們在東南亞與華僑相遇，雙方原本可能來自於相同的家鄉，甚至說著相同的語言，此時卻有了新的關係。這些史事在在挑戰了一般所理解的華僑史、臺灣史、東南亞史的範疇。本文希望分析華僑、臺灣人、東南亞原住民如何被戰爭影響，改變了自身的命運，以及不同族群間互動關係的變化。

以上這類主题幾乎沒有研究成果，並且由於戰爭的破壞，目前遺留在東南亞的文獻非常不足，因此只能在非常零散的史料、回憶錄、傳記和書籍中逐一搜索，雖然未必能夠淘沙成金，但是希望還原一部分當時各族群的交流與互動情況。

## 二、太平洋戰爭中華僑與臺灣人的互動

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衛內閣提出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基本國策綱要」，8月1日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發表〈皇道外交宣言〉，公開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正式使用「大東亞共榮圈」一詞。1941年7月27日日軍占領越南全境。法國維琪政府隨即與日本達成協議，形成法、日共治越南。1941年8月日軍占領柬埔寨。（註1）

1941年12月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隨即迅速向香港、東南亞各地發動太平洋戰爭。1942年1月31日日軍完全占領馬來半島，並實施軍政。1942年2月15日（筆者按：適逢農曆新年正月初一）駐新加坡英軍對日軍投降，日軍遂統治新加坡。1942年3月日軍占領印尼爪哇。1942年5月15日日軍宣布占領全緬甸。5月，日本占領菲律賓全境。（註2）

在日軍占領下的東南亞，原本居住在此的人數眾多的華僑立即成為被統治者。他們不但要面對日本人的統治，並且很可能與擔任日本兵的臺灣人有所接觸。

同一時間，臺灣總督府在臺灣募集不少「勞務戰士」，1942年7月開始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943年8月開始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所謂「志願」，其實是強迫徵召。開戰後不久，臺灣即設立拓南工

業戰士訓練所、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海洋訓練隊等三個訓練所，這些訓練所的工作，是為了訓練要被送往日軍支配下的東南亞之臺灣青年。（註3）因而有不少臺灣青年被送往東南亞參與戰爭。

日本徵募大批臺灣人前往東南亞，主要擔任軍夫、軍屬、從軍看護婦等，其工作性質包括從事運輸工作、翻譯人員、軍農夫、製鹽工人、獸疫研究者、監視員。（註4）

當時臺灣人較大多數是閩南人，而東南亞地區有不少閩南華僑，彼此語言可以相通，因此臺灣出身的士兵和軍屬往往以通譯的身分，被日軍利用來處理東南亞的華僑事務。（註5）日本方面也承認，「因為臺灣籍民有其特長，是以在這次的中日戰爭和大東亞戰爭中，徵召用為軍方通譯或軍夫者，均能發揮其語言能力，協助作戰，其功不可沒。」（註6）

臺灣人擔任日軍的通譯，當他們面對華僑時，究竟是會因為血緣相近、語言相通而友善對待華僑，或者是認真執行上級命令、依法處理而壓制華僑呢？在有關東南亞華僑的文獻記載中，臺灣人既可能善待華僑，也可能傷害華僑。

馬來西亞華人詩人吳岸認為，大部分臺籍軍屬，雖然不通北京話，但對自己同胞仍然友善，惟部分臺灣巡查補（原按：類似警察役），可能受日警蠻橫訓練，對當地華人大呼小叫，動輒辱罵，狐假虎威。（註7）

1942年2月日軍占領新加坡，並將新

加坡改為「昭南島」(Syonan)。攻占新加坡的是日軍第二十五軍，其軍政部的參謀官無人能懂華語，於是僱用幾名臺灣人，負責處理華僑事務。日軍進新加坡後，展開肅清「敵對的華僑」(筆者按：一般稱之為「大檢証」)，有一些華僑是在臺灣人和某些華僑密告者的協助下被捕的。(註8)

在日本占領下的「昭南島」，臺灣人黃堆金持續出現在日軍與華僑的聯絡事務上。他被記載為一個恐嚇華僑、耀武揚威的通譯人員。

昭南特別市厚生科長篠崎護戰後的回憶錄《新加坡淪陷三年半》，對於臺灣人黃堆金在戰時新加坡的活動有如下的描寫：華僑協會設立的真正目的，是在拯救並保護華僑，但表面上是打著與日軍合作的招牌，因此，反為日軍所利用。……(筆者按：軍政部長渡邊大佐)派隨他同來的內田顧問與臺灣人黃堆金任職協會，……，辦事處裡，有來自臺灣的黃堆金(原按：黃氏戰前住在新加坡，在日本人開辦的南洋倉庫任管棧)，掛著軍刀，以流利的福建話指揮著。由於黃堆金的耀武揚威，市政當局對他的評價並不好，因此大達市長將此事告知渡邊軍政部長，在捐款工作結束後(原按：奉納金)，令黃堆金離開協會。日本戰敗不久，他和他的家人都被馬共所殺(原按：有人說是病死)。(註9)

篠崎護的回憶或多或少有著為日本戰時的活動及自己的行為辯護的意味，不過，他

對黃堆金的行為之描寫卻是負面的。

新加坡華僑戰後留下來的記載如下：臺灣人黃堆金是軍政部的「通譯員」兼日本軍事當局與華僑社會之間的連絡員，1942年2月27日華僑領袖集合於吾廬俱樂部時，黃堆金向他們傳達日本軍事當局的一份恐嚇性的訓詞後，又哄這些無助的華僑領袖，擬出與日本人合作的建議，以便呈交給大石上校。(註10)

在菲律賓，也有一位重要的臺灣人張海藤，作為華僑與日人溝通的橋樑。1942年1月日軍先頭部隊進入馬尼拉，不久臺灣醫生張海藤來見菲律賓華僑領袖楊啟泰，張海藤說，憲兵已出令抓人，第一、二批名單已發出，將來凡屬抗敵會、黨部及支分部(筆者按：是指國民黨黨部)、商會，及各途商會重要分子，均要被抓，最好能自己集中在一處，免得憲兵到處抓人騷擾，因為帶兵出來的本地日人，對華僑印象甚壞，恐怕會乘機報復，有毆打或槍殺事件發生。楊啟泰說，集會是有干禁令的，數十人集一處，日兵認為聚眾作亂，全體打殺，豈不更糟？張海藤認為楊啟泰所考慮的有理，就打電話向姓朱的疏通，且慢抓人。後來張海藤就親自到日本憲兵部去，回來時帶了兩張名片，一張寫著：中國人集會，身命保障安全(筆者按：應是「保障生命安全」)，另一張寫，中國人自動投到(筆者按：應是「報到」)，身命保障安全，簽名是兒玉憲兵中佐。張海藤就將第一張名片給楊啟泰，第二張自己留

著。1月8日上午楊啟泰等一行42人就在青年會集中，張海藤以電話通知日本憲兵，憲兵中尉大倉就帶了憲兵十餘名，將楊啟泰等人全體押往菲律賓大學校舍拘留所。他們到校舍時，中華民國駐菲律賓的楊光洸總領事、莫領事等都已在那裡。4月中旬他們受軍法審判，本來擬定全體死刑，張海藤就根據兒玉中佐簽字的名片，向軍法部及憲兵部力爭，日本憲兵部也因面子關係，向日本軍部反映，所以將楊啟泰等人分作兩批，第一批28名改判20年監禁，第二批9名則被槍決。（註11）以上是楊啟泰的回憶，在他的印象中，臺灣醫生張海藤是盡力保護華僑的。

也有臺灣人寧可與華僑在一起，而不願受日本人的欺壓。菲律賓華僑游擊隊「特工總隊」一位隊員郭恕儀先生提到：抗日時，郭恕儀的游擊隊有一位鄰居名叫阿元，是臺灣人，被日本人虐待，當郭恕儀及其游擊隊要搬家時，阿元表示要和他們一起離開。游擊隊經過仔細觀察後，知道他無暗行，就答應了。到了山上，阿元才知道他們是特工，且生活非常艱苦，但是他仍然願意和他們同甘共苦。臺灣光復後，阿元就回去了。（註12）

也有華僑與臺灣人是完全處在敵對關係中的，甚至欲置對方於死地。一個臺籍的首要情報人員，曾經利用閩南語而接獲消息，帶領日軍捕捉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隊「血幹團」人員（筆者按：這是屬於國民黨系統的抗日武裝團體），致使「血幹團」三十多人

被逮捕，而遭受殺害。此人被「血幹團」視為最大的兇犯，必欲置之於死地。1945年2月，美國反攻菲律賓時，「血幹團」接獲情報，即設法將他捕捉，「血幹團」內部對於如何處置此臺灣人曾經出現激烈爭議，但是最終仍將之處死。（註13）

### 三、太平洋戰爭中華僑與東南亞原住民的互動

在日軍占領下的東南亞，原本居住在此的、人數眾多的華僑立即成為被統治者，當然東南亞各地的原住民也同時都成為被統治者。不過，由於華僑在太平洋戰爭前曾經大力支援中國對日作戰，他們往往受到日軍的報復。同時，在當地的原住民則有很不一樣的命運。

日本占領馬來亞（筆者按：指當時英屬的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後，一方面對於抗日的華僑加以逮捕、殺害，（註14）另一方面對於原住民的馬來人則希望取得他們的合作；於是華僑與馬來人對於日本的統治政策有著截然不同的觀感。

日軍對於馬來民族採取懷柔政策，挑撥離間，擴大華僑和馬來人之間的矛盾，提出「馬來亞是馬來人的馬來亞」等口號，鼓動馬來人的民族主義，起用馬來人擔任行政官員和警察，用以對付華僑，甚至製造糾紛，引起排華。（註15）

在日本統治下的馬來人領袖可分為四種

類型：（一）蘇丹和貴族，他們都與日本合作；（二）宗教領袖，日本企圖扶植這些人，表態支持伊斯蘭教，但是被一部分士兵和地方官僚無感覺的行為所抵消；（三）成為日本行政體系的官僚和鄉村頭人，他們必須幫助日本徵募強制性勞役，並實施日本的政策，他們中的有些人被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筆者按：這是馬共主導的抗日軍，隊員幾乎都是華僑）殺害，而其中有許多人失去人民對他們的信任；（四）戰前的馬來人民民族主義組織之領袖，日本官員堅稱這些人培植了馬來極端分子，但其中一個組織 KMM 的領袖 Ibrahim Yaacob 否認他提供活動的援助，宣稱他已經承諾 KMM 不會抵抗日本的進攻。（註16）

由於比較多數的馬來人是採取與日本合作的態度，並且他們中的第三類人又是實際執行日本政策的人，甚至是逮捕華僑入獄的公務員，這又遭到抗日的華僑的惡感，甚至導致華僑去暗殺擔任官僚的馬來人，因此華僑與馬來人的關係持續惡化。

在印尼，反荷蘭殖民統治的印尼人歡迎日軍的到來，希望荷蘭投降日本後，印尼人有機會獲得獨立。日本也起用大批印尼人擔任公務員。（註17）不過，並沒有什麼記錄顯示印尼人擔任日本統治下的公務員而與華僑有重大衝突。或許可以說，由於馬來亞、新加坡是華僑抗日的大本營，日軍對馬來亞、新加坡華僑的報復比較激烈，連帶地，使馬來人逮捕華僑的事例被突顯了。而在印

尼，日軍對華僑的報復相對較少，印尼人執行日本人報復華僑工作的案例也就不那麼明顯。

在日本統治下的印尼，一個特别的例子是中國著名文人郁達夫的遭遇和事蹟，他在擔任日軍的通譯時，曾經幫助不少華僑和印尼人脫罪。1938年12月28日郁達夫應聘擔任華文報《星洲日報》的編輯而來到新加坡。他在此從事抗日宣傳，也在文化啟蒙活動方面留下巨大足跡。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郁達夫就任「文化界戰時工作團」理事、團長，及「戰時青年幹部訓練班」大隊長、「抗敵動員委員會」文化界執行委員等職。日軍進攻新加坡後，郁達夫與友人一起逃亡，改名趙廉，落戶於印尼一個小鎮巴爺公務。在此處，由於郁達夫曾留學日本，日語流利；鄰近的武吉丁宜之日本憲兵隊長知道趙廉是當地唯一懂日語的華僑，就親自去巴爺公務，把郁達夫帶到武吉丁宜擔任翻譯。郁達夫當翻譯期間，幫過很多人的忙，其中大部分是印尼人。他在翻譯印尼人的供詞時，有意地替他們減輕罪證，為此開脫不少印尼人。然而郁達夫見到日本人的暴虐腐敗，決定辭職。後來郁達夫的真實身分被日本人發現。1945年日本投降後，日軍可能擔心郁達夫知道太多他們的劣行，而將郁達夫殺害。（註18）

在菲律賓，菲律賓人抗日的團體較多，與華僑的某些抗日組織有合作關係。菲律賓華僑抗日武力有五、六個著名的組織，

其中有幾個屬於國民黨系統，一個屬於共產黨系統。國民黨人組成的「菲律賓華僑抗日義勇軍」曾與美國、菲律賓游擊隊進行合作。(註19)而共產黨人組成的抗日武裝團體有「華支」，「華支」的起源與菲律賓人抗日部隊有關。原本有一部分菲律賓華僑曾參加菲律賓人的抗日部隊(The Philippine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或稱為 Hukbalahap, 簡稱 Huk, 即後來菲律賓虎克黨的前身), 但因不懂當地語言, 而後脫離菲律賓的 Huk 抗日軍隊, 自行成立新團體, 即「華支」。(註20)

泰國人與華僑的關係具有多重性, 一方面, 泰人打壓華僑的抗日活動, 但是想要抗日的泰人又尋求華僑的合作。

泰國是東南亞各地中唯一未被殖民的獨立國家, 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後, 就已靠攏日本, 致力於打壓華僑支援抗日的活動。(註21)

1941年12月8日, 日軍登陸泰國, 泰國政府決定與日本合作。隔天泰國政府就開始逮捕與重慶國民政府有關係的任何華僑。居住在曼谷的重要華僑領袖, 遭到各種不同的命運。有的逃出曼谷, 回到中國; 有的躲到他處; 大部分人仍留在曼谷。留下來的華僑領袖有的遭到逮捕, 有的與日本人合作。(註22)

雖然泰國政府與日本合作, 壓迫華僑, 但是也有一部分泰國人選擇對抗日本。1943年泰國人也組織了地下團體來進行反日, 其

中以「自由泰國」的活動最為重要。這個活動由泰國人鑾巴立領導, 華僑的幾個地下組織與這個運動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關係。(註23)

泰國華僑領袖陳守明則是另一個暗中與泰國人合作抗日的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他被迫與日本合作, 成為日軍操縱華僑的工具。陳氏一面與日軍周旋, 一面參與秘密抗日活動, 盛傳他可能資助國民黨人所辦的《中國人報》, 進行抗日宣傳工作。他也與「自由泰國運動」取得聯繫, 從事秘密工作。他並不認為自己是漢奸, 卻在日本投降的次日遭到暗殺。(註24)陳守明被刺後, 中國國民黨蔣中正總裁特電慰唁。(註25)也足以說明中國政府對陳守明的看法, 並不認為陳氏是漢奸。

#### 四、結語

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 東南亞各地相繼淪陷, 在當地的華僑和原住民立即成為被統治者, 而日本人、臺灣人成為統治者。華僑在面對統治者的臺灣人, 以及同是被統治者但又是不同種族的原住民, 引發了各種不同的人際互動, 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對於統治者的日本人究竟是合作或者反抗。

日本人一方面以「大東亞共榮圈」為號召, 藉以謀求東南亞原住民的合作, 一方面驅使臺灣人為其所用, 而真正要對付的是東

南亞抗日的華僑。前往東南亞的臺灣人、居住在東南亞的華僑、東南亞的原住民三個族群在日本控制下，被動地回應這場戰爭的種種變化。

東南亞華僑基本上是抗日的，而臺灣人此時是與日本人合作的，然而閩南華僑又與臺灣的閩南人有語言和地域的同源性，因此有些臺灣人對華僑友善待之，但也有些臺灣人以日本統治者之命令為依歸，對華僑橫加侮辱，甚至加害。

東南亞各地的原住民對於日本的統治各有不同的回應，大抵想要抗日的東南亞原住民對於華僑是友善並且設法聯繫合作；但是想要擺脫歐洲殖民者而尋求獨立的東南亞原住民則是致力於與日本人合作，對於華僑可能是壓迫，也可能依據日方的命令而行事。

一場戰爭，在不同種族、地位、思想的人群之間，引發了多重的人際互動，也顯示了他們對於這場戰爭的不同應對方式和心態。

【註釋】

1. 趙建民、劉予葦主編，《日本通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年），頁335-338。  
李盈慧，《抗日與附日：華僑、國民政府、汪政權》（臺北：水牛出版社，2003年），頁59。  
梁英明等編，《近現代東南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526。  
李明峻編譯，《東南亞大事記（1900-2004）》（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6年），頁240、285。

2. 〈東南亞與臺灣大事年表〉，李盈慧、王宏仁主編，《東南亞概論：臺灣的視角》（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8年），頁230-233。
3. 後藤乾一著，李季樺譯，〈臺灣與東南亞（1930-1945）〉，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頁78-81。
4. 周婉窈，〈日本在臺軍事動員與臺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臺灣史研究》，第2卷第1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年），頁89-90、103、111。
5. 後藤乾一著，李季樺譯，〈臺灣與東南亞（1930-1945）〉，頁79。
6. 大田修吉，〈臺灣籍民の南洋に於ける活動狀況〉，卞鳳奎譯，〈臺灣籍民在南洋的活動狀況〉，《史聯雜誌》，第34期（1999年6月），頁137。
7. 李展平，《戰火紋身的監視員：臺籍戰俘悲歌》（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7年），頁149、183。
8. 莊惠泉輯，許雲樵編，蔡史君編修，《新馬華僑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公司，1984年），頁308、317、319。
9. 篠崎護著，陳加昌譯，《新加坡淪陷三年半》（新加坡：泛亞通訊社，1982年），頁61-64。
10. 莊惠泉輯，許雲樵編，蔡史君編修，《新馬華僑抗日史料，1937-1945》，頁321。
11. 劉芝田編著，《中菲關係史》（臺北：正中書局，1964年），頁644-647。
12. 張存武等訪問，《菲律賓華僑華人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頁139。
13. 血幹團總部團史編纂委員會編，《菲律賓華僑血幹團——地下抗日工作史錄》（無出版地：血幹團總部，1997年），頁148-150。
14. 日本對馬來亞、新加坡華僑的報復、逮捕、殺

- 害，相關記載以莊惠泉輯，許雲樵編，蔡史君編修，《新馬華僑抗日史料，1937-1945》一書最為詳盡。
15. 陳松沾，〈日治時期的華僑（1942-1945）〉，收入《馬來西亞華僑史新編（第一冊）》（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1998年），頁103。
  16.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941-1945* (Australia: Allen and Unwin, 1998), pp.109-110.
  17. 晁華，《印度尼西亞華僑滄桑》（香港：商務印書館，1990年），頁104-108。
  18. 鈴木正夫著，李振聲譯，《蘇門答臘的郁達夫》（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二版），頁7-12、25-57、106-110、151-152、230-235。
  19. 張存武，〈菲律賓華僑抗日活動（1928-1945）〉，華僑協會總會編，《華僑與抗日戰爭論文集》，上冊（臺北：編者自印，1999年），頁294-296。〈施友士先生訪問紀錄〉，收入張存武等訪問，《菲律賓華僑華人訪問紀錄》，頁167-170。
  20. Yung Li Yuk-wai, *The Huaqiao Warriors : Chinese Resistance Movement in the Philippines, 1942-19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Manila: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81、84-85. 泉州華僑抗日史編委會，《菲島華僑抗日風雲》（廈門：鷺江出版社，1991年），頁51-93、208。張存武，〈菲律賓華僑抗日活動（1928-1945）〉，頁298-301。
  21. 李道緝，〈泰國華僑國家認同問題（1910-194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6月），頁186-187。
  22.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57, second printing 1962), pp. 273-275.
  23.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pp. 275-276.
  24. 李道緝，〈泰國華僑陳守明與抗日戰爭〉，《華僑與抗日戰爭論文集》，下冊，頁786-787。
  25. 「海外部李樸生呈吳鐵城函」（卅五年四月十三日寫），《泰國僑務卷》，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特015/15-1。